



# 90年代的小镇年味

章柠檬/文

有一种过年仪式叫烫头，有钱没钱，烫头过年。那时，温岭人民路有一家理发店叫月河理发店，名字实在，店面更实在，都不在街面上露脸，要从牛轭街旁边的小弄堂拐个弯进去。就这眈眈，却是老城关人，尤其是城关女人最爱捧场的个人形象加工坊。

一到年底，那30平方米左右的老石板屋便挤满了人，色彩斑斓，谈笑风生，几乎全是女性同胞，估计男人们都识趣地退出了年终烫头高峰期，让女人的烫头精神尽情发挥。即便这样，店里还是挤不下女人，天气好的时候，她们就在店前的院子里排着小板凳坐着等。对于烫头这项耗时间的工程，她们都是有备而来的，有嗑瓜子聊天的，有扎堆打毛衣的，有纯粹晒太阳的，就是不着急不烦躁，一派和谐欢乐的氛围。这大半是来烫头的妈妈，其中就有我妈。

那时的时尚不分个性，就一个标准，流行啥，啥最美。那年流行大波浪卷，那个老板娘长得美，大眼睛、皮肤白皙、身材丰腴，就自己顶着一个大波浪头，轻而易举地引领了整个小镇女人的时尚。妈妈们不管脸大的、脸小的，发量多的、发量少的，年龄大的、年龄小的，对头发就一个要求，烫，最好都能烫成大波浪。

烫头的热情可以用气味来形容，就是 you 从人民路的东头走到西头（那时的人民路短，没有东延西延一说），都能隐隐闻见一股烫发水的味道，因为街上的女人不是在烫头，就是在去烫头的路上。

年底忙，但那时的孩子忙的是寒假的各种玩，就会被指派到理发店给妈妈占位置。等妈妈上场了，我们就撤了，玩够了再去时，会发现妈妈比较难找了，因为所有的妈妈几乎都顶着同一款弯弯曲曲的大头。

好看吗？这问题对她们来说太肤浅了，总之她们从理发店出来的那一刻，春风就吻上了她们的脸，桃花就盛开在她们的嘴角，她们认

定自己洋气了至少10度，走路来都有律动了，或许是想让每一卷发都弹动起来，弹奏出她们一年中最大的自信。所以，那时叫烫头，而不是烫发，是一种完全能让头脑发热、虚荣心膨胀、优越感沸腾的女性集体迷惑行为。

那时，头等的事并不贵，理发3到5元，卷发10到20元。店里没有种类繁多的洗发水、烫发水以不同的价格向你推荐，没得选，就是一种。也没有1号老师、2号老师、3号老师等托尼们的理发价格表，没得选，店里就一个老师头。统一的发型收统一的价格，统一的待遇制造统一的快乐。

烫完头，妈妈们的新年就从头开始、崭新启动了，她们会带着头发上卷起的那股强大动力，喜笑颜开地投入到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年准备工作中，每家 的新年气象应该都是从妈妈的烫头开始的吧。

现在，像月河理发店这样的老店早已被高端大气的美发沙龙取代，人民路也将大变样，时代奔涌不息，时尚快得猝不及防，女人们不要说动个头发，搞个医美都是寻常。时尚变大了，变得无比多样又触手可及，而我们 从时尚中获得的幸福感却变小了，小得无法撬动新年。

快到年底的时候，温岭剧院的斜对面就有一溜写春联的。这个地儿是人民路最敞亮的，街对面低矮的民房让早起的太阳一跃而过，亮晃晃地冲向一帘帘红晃晃的春联纸上，戴着眼镜的几位老先生就在这片红色的海洋中挥洒笔墨。

写春联的可不仅是文化馆里的书法家，也有民间高手，这儿是他们展示才艺的舞台，也是出售年味的小摊。

俗话说：无联不成春，有联春更浓。墨香、暖阳、祝福、守望，他们和春联的出场，就是人民路吹响的新年的号角。不一会儿，两张写春联的大桌前便围满了人，有城关人，也有特意赶过来的乡村人，有识字的，也有不识字的。大家认真地观望着老先生的一笔一画，一笔笔苍劲的书法，一个个俊逸的字

体，一句句诚恳的祝愿，会时不时引来啧啧称赞：好！好！

那时的人们虽然不具备富裕的物质条件，但对春联是有个性要求的，这是一种必须满足的精神食粮。每家每户的前门、后门、房门、灶门等都要贴上春联。有些房门，又要分东厢西厢、前庭后院，只要是门，统统要贴春联。而贴的春联又不能雷同，一定是有区别、有讲究的，前门有前门的气象，后门有后门的风水。我们贴在每道门上的春联都有它特定的含义，比如前门常贴“门迎四季平安福，地聚八方鸿运财”，后门常贴“万紫千红百花齐放，三江四海五谷丰登”。

现场也有定制春联的，写春联的老先生们可用心了，也许这是一份传递吉利的差事，必须照顾到人的心坎里。他会问：您家是上班的还是做生意的？您家是儿子还是姑娘？您是给新房贴还是给老屋贴？诸如此类，一个问得谦谦和和，一个答得诚诚恳恳，哪怕是不识字的人，也很愿意跟写春联的老先生唠上好一会儿，久久才定下写什么字。比如农家人适合贴“春归大地绿，人勤春来早”等，生意人适合贴“商通五湖四海，财聚四面八方”等。写好的春联会被小心卷成卷，包上一层旧报纸，再箍上一根皮筋，然后毕恭毕敬地交给主人。

接过春联的人，像接过了一片祥云，喜悦而轻巧地离去。赶来写春联的人，像赶赴一场希望，匆匆赶，慢慢等。就这样，人来人往，一副副春联像老先生亲手派出的火苗，燃烧在岁末寒冷又热闹的街头，燃烧在渴望美好生活的人们心中，燃烧在家家户户高高的门楣上。

现在的春联变美了，也变轻了，打印款春联琳琅满目且包装精美，甚至这几年还出现了机器人写春联，内容千篇一律，不觉得失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灵气和韵味吗？让人不得不怀念老春联的庄重和诚意。

最后说一说卖鱼桥糕饼店，其实30年前就没有店名，只是它在卖鱼桥附近，这是当地人的习惯叫

法。店名或许对它来说，根本不重要，因为当年小镇小啊，小到就这一家糕饼店，它几乎承包了小镇人舌尖上的香甜。

过年这种大事，肯定少不了卖鱼桥糕饼的参与，小糕条、油柱、鸡角脚、橘红糕、八杏酥、九里香，方言的特定称谓赋予了它们朴实又喜庆的芳香。在那个物资匮乏又单调的年代，店老板仅靠面粉、白糖、香油、芝麻、花生等，就能做出一大堆多种颜色、不同形态、各具味道的糕点，极大满足了我们这些孩子对散嘴的渴求。过年，会将这种渴求瞬间放大。

到卖鱼桥去啦！家长一提，孩子们便懂了。年关将近，这家店每天的客人便络绎不绝，有时还会排起长队。比长队更长的是店里飘出的阵阵香味，远远就能闻见。店面不大，食材很新鲜，基本现做现卖。我们在挑选可口的糕点时，就能看见店里的师傅驼着背在里间不停地揉面、拌料、烘烤，一屉接一屉冒着热气的糕点被端出来放入柜台上。尝！尽管尝！孩子们哪经得住店员的这种引诱，一边被大人笑骂，一边干脆利落地挑起一块往嘴里塞，小嘴都要粘在柜台上了。尝得越多，大人买得越多，过年不就是让孩子图个嘴上的过瘾吗？

花花绿绿的糕点会被家里的老人拿出部分请到供台上，再藏好一部分，等到过年享用。等不及呀，根本等不及，我将妹妹抱起，还使劲踮起脚，费了好大的劲才让她偷下供台上的糕点。两人吃得满嘴白花花，甜翻了，又噎得快喘不上气了，心里仍觉得美得不行。

现在，卖鱼桥糕饼店已关门了，前几年也仅在中秋节时会排起长队。如今，很少有孩子去打这种老糕点的主意，超市里琳琅满目的零食令他们吃不过来，但他们很少能吃出我们当年的那种香甜。

## 上王的灯

沙漏/文

小时候的年是一直过到正月十六的，十四那天村里家家户户都是要做正月半的，祭团团圆，比元宵那晚更热闹。一轮明月高悬天际，家门口挂着的那盏纸糊的灯不知何时都点亮了，蜡烛的清光和月色遥相呼应，让这个平凡的小村散发着祥和的气息。

大多数人都知石桥头上王的大灯，因其曾闻名六县，看大灯的人之多，甚至有一下黄桥头姑娘抢走无处寻的担忧，可鲜少有人了解这称为“人灯”的小灯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在大灯消失在世人面前的时候，“人灯”却一直努力留存在上王人的元宵庆典之中。人灯是方形的四角花灯，外糊白色纸，贴红色窗花，内放一蜡烛。这盏小灯不可不提，内撑竹竿，需高高举起。当锣鼓敲起后，村民们送自家的孩子举着灯加入到环村游行的队伍中。儿时的我在没有路灯的乡村小道上，跟着这白色的烛光，庄重地举着灯，从未畏惧过夜色。游行后熄灭蜡烛，第二天晚上再次点燃，游行三晚，在正月十六将其焚烧，以保佑平安。

没有大灯在前引路的人灯是寂寞的，在记忆中忽明忽暗。直到2002年，一对龙凤宝塔大花灯在村头重放光明，那年的迎大灯活动吸引了10万余人前往观赏。之后，上王村王氏大花灯每4年制作一次，从正月十四至十六巡游展示。在大花灯的身后，每到一处，孩子们争相举灯，紧随其后，白烛摇曳，连成一条长龙般的队伍穿梭在村子中，杂而不乱地紧跟随着，仿若空中繁星坠落，直至祠堂方可停歇。

如今，花灯又一次淡出了世人的视线，但“人灯”却不再落寞，它静候于上王文化礼堂中。每逢假期，会有来自温岭各个学校的孩子们，在非遗传承人王妙顺的指导下制作创意花灯。花灯不少见，却有更多的人愿意让孩子们来上王村亲手做上一盏，了解始于清康熙年间的大灯历史，穿梭330年的时光，感受花灯在历史沉浮中依然坚守的传统之美。

春节，我也要带上孩子，在一剪一粘之间，让他用稚嫩的小手做一盏，待到正月十四，高高举起，用纯善之心祈祷国泰民安。

民俗，其实就是一代又一代人共同的愿景，就像那人灯的光点一般接连串起，即使沉沉浮浮也不会断开。

## 叶公好龙 别解

胡胜盼/文

2024年是农历甲辰年，即龙年。我下意识地想到了成语“叶公好龙”。

提及“叶公好龙”这个成语，在中国不能说是妇孺皆知，也算得上是深入人心。如果说要给“叶公好龙”找一些近义词，那么很多人会在脑海里滑过“表里不一”“两面三刀”“口是心非”等。可知，人们记住这个成语在于它的批判内涵。但是，在笔者看来，成语的主人公叶公其实很委屈。

“叶公好龙”出自汉代刘向所著的《新序·杂事五》，原文为：“叶公子高好龙，钩以写龙，凿以写龙，屋室雕文以写龙。于是天龙闻而下之，窥头于牖，张尾于堂。叶公见之，弃而还走，失其魂魄，五色无主。是叶公非好龙也，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。”意思是说，春秋时楚国贵族叶公子高很喜欢龙形的东西，不但衣带钩、酒器上都刻着龙，居室里雕镂装饰的也是龙。他的这种狂热喜爱感动了天上真正的龙，它从天上下降到叶公家里，龙头搭在窗台上探望，龙尾伸到了厅堂里。叶公一看是真龙，转身就跑，吓得失魂落魄，惊恐万状，不

能自己。在最后一句中，看待叶公的这种举动，刘向的定论是：叶公并不是真的喜欢龙，他喜欢的只不过是那些像龙的东西，而不是真龙。

正因为刘向对叶公的另类喜爱作出了正式评价，所以“叶公好龙”就掉入了贬义词的深渊难以翻身了。后世以“叶公好龙”来比喻自称爱好某种事物，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爱好，甚至是惧怕、反感；并借以辛辣地讽刺叶公式的人物，深刻地揭露了那些只唱高调、不务实际的坏思想、坏作风；同时也讽刺了那些名不副实、表里不一的人。

由“叶公好龙”，想到另一个成语，叫“爱屋及乌”。“爱屋及乌”出自《尚书·大传·大战》：“爱人者，兼其屋上之乌。”解释为：因为爱一个人，而连带爱他屋上的乌鸦。比喻爱一个人而连带地关心到与他有关的人或物。与“叶公好龙”并列相看，“叶公好龙”属于贬义词，“爱屋及乌”则多用于褒义。可是要问，如果我爱一个人却并不爱他屋上的乌鸦，怎么办？如果我是叶公，我就是仅仅喜爱龙形东西，或者说喜爱的仅仅就是艺术化了 的龙，而不是现实的真龙（且不论龙是否存在），这样有错吗？

从“叶公好龙”到“爱屋及乌”，还想举一个当下的例子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的部分衣服上流行起了以骷髅作为装饰。时代在进步，社会在发展，人们对于平常事物的接受能力越来越强。但即便如此，我想身穿骷髅纹饰衣服的朋友也应该只是接受这种纹饰，倘若真的拿一个白骨骷髅出来放到他或她的手里，不知会被吓成啥样。由此推论，是否觉得叶公很委屈呢？他爱龙形纹饰，不爱面目狰狞的真龙，有错吗？艺术来源于现实，又高于现实，艺术与现实存在一定的差距，这其实是符合科学规律的常识。

比如说戏曲舞台上的武戏。戏曲武戏是通过一系列程式化的舞蹈动作，来体现剧中人物肢体冲突，反映故事情节的。欣赏戏曲武戏，不管是演员以肢体表现的翻转腾挪，还是以刀枪把子表现的击打穿刺，都是那样美，那样令人陶醉，观众们津津乐道于其中，因为这是艺术化了的武打动作。但是，你是否想过戏曲武戏反映在现实里又是什么呢？不错，是打群架，或者是战争。血腥、残酷、野蛮。如果不是心理畸形，没有人会喜欢现实中的暴力。可知，喜欢武戏就是喜

欢武戏，它与暴力无关。这不就是所谓的“叶公好龙”吗？叶公喜欢艺术龙就是喜欢艺术龙，它与真龙无关。

杨绛先生曾在《记钱钟书与围城》中记述过一件趣事：一位美国女士在读了钱钟书的《围城》后，十分敬佩，要登门拜访。钱钟书在电话中说：“假如你吃了个鸡蛋，觉得不错，何必去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？”每每想起这个故事，又会思考“叶公好龙”。其实，那条真龙真不该去叶公家里。人家叶公喜欢你的想象化存在，心里感念着就行了，何必现真形吓煞人家呢？本来叶公只是默默地执着“追星”，被真龙的“倒追星”一搅乱，反倒落了个千古骂名，实在很冤。

笔者揣测，钱先生之所以拒绝那位美国女士的拜访，是因为他深知艺术品与艺术创造者之间是存在差距的。艺术品可以被创造得美轮美奂，惊天动地，感人肺腑，但艺术创造者是活生生的人，所以“爱屋”即可，至于“及乌”另当别论。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，难得糊涂在很多时候反而会收获内心的充实和对人、事、物的敬畏。

别解“叶公好龙”，在于独立眼光，在于反向思考，在于读人读己。

